



老建筑

“井”话乡史

□江茗

古邑如皋，古井甚多。据相关文保单位不完全统计，如皋拥有400余口古井。上溯唐朝，下迄民国，历朝历代的老井，散落屋前屋后，见证着家乡的历史变迁。

论及历史，“双胞井”的年龄已逾千岁。这对唐井，位于如城街道大治街，原为广福寺生活用井。井衣长2米，宽0.8米，椭圆形井壁，原用带榫卯竖砖砌，长径1.4米、宽径0.8米，井深约10米。此井开有双孔，内径0.33米。两孔相距0.3米，左右对称，故名“双胞井”。本世纪初，由于旧城改造，“双胞井”被封于今石合泰东大门附近。

相比“双胞井”，另一口唐井“玉涓井”素为如皋文人所喜。玉涓井，深约10米，原为唐时中禅寺生活用井。“玉涓井”一名滥觞于明代冒氏族人的称呼。井壁原用榫卯竖砖圈砌。现存井栏系宋代遗物，呈圆鼓形，外径1.36米、内径0.66米、腹径0.75米、高0.45米。此栏为大理石质，外雕祥云凤凰等图案，十分精美。《如皋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图册》记载，“玉涓井”一名滥觞于明代冒氏族人的称呼。清初如皋籍进士许嗣隆为玉涓井撰文，录入乾隆本《如皋县志·卷二十二·名胜志中·井》：盖闻沉潜降液，九醞成甘醴之篇；喷玉飞瑶，德与香醴之颂。味本天和，协太阴而化泽；气通地脉，体上善以流膏。维彼流泉，实是地德。是以华峰叠映，仙葩分玉井之光；瑶水花澄，石乳遍金茎之色。凡有灵源，不遗竹册；若称元液，悉载《水经》。况兹皋邑，实属广陵。为大夫射雉之乡，包罗河海；当公子捐金之地，襟带江湖。既称泽国，自有润下之基；相彼仙源，更在坎流之外。故琼井、潮井，分著其名；霞泉、露泉，各殊其号。惟玉涓之胜概，成东土之甘流。然而万事星移，百年云变，旁求故址，博采遗闻；曾文昭之书屋，谁知隐玉之轩；考王学士之诗篇，徒咏桐阴之句……

文中提及“隐玉之轩”，即今隐玉斋，中禅寺（即雨香庵）旧址，曾肇（一说曾巩）读书处，玉涓井所在地。雨香庵为如皋名胜，春有牡丹、冬有梅花，又位于水明楼畔，地方文人常于此雅集，流觞吟诗、合影留念。冒程《雨香庵看牡丹》、沙元炳《学周召集雨香庵看牡丹》《雨香庵送善》、郭仲达《雨香庵梅花》等等诗作，皆可佐证。文人雅聚庵中，又或善男信女来此，悉需品茗饮水，邑人吴维翰写下：中名人刹育甘泉，涌出清流字玉涓。疏凿当时道古迹，重开此日鼎彝贤……茶铛丹灶自年年。好一句“茶铛丹灶自年年”，道尽玉涓井水煮茶的忙碌景象。那么玉涓井的水质如何呢？《如皋县志·卷二十二·名胜志中·井》还有记载：“玉涓井，在旧儒学，即今中禅寺，井水极清冽。”“清冽”说明玉涓井水为洁净。令许嗣隆念念不忘的“考王学士之诗篇，徒咏桐阴之句”，更是诠释了井水清冽之妙。王学士即北宋如皋籍进士王观。他有诗录入《东皋诗存》，赞曰：“覆栏常漫桐阴冷，煮茗犹呈玉邑寒。”古井位于大桐树下，常年浸入树荫寒气，井水入茶，犹如玉色寒水涓涓细流，想必色香味俱全。玉涓井名副其实。

若说玉涓井美在雅气，那么度军井胜在名气。度军井常被民间人士津津乐道。度军井，宋代已有，位于如皋袁桥（今属北开），井栏呈八角形，俗称“八角井”。井高0.45米、内径0.36米、外径0.60米，原井砖有榫卯，竖砖围砌，颇具唐风。相传，岳家军过此，千人饮用井水。《如皋县志·卷二十二·名胜志中·井》记载：度军井，在县治西十里许，地名圣井栏。旧志云：“井虽浅，泉常不竭。汲且竭，其其栏，旋复溢出。宋岳飞经略通泰，过此，数千人饮之不竭，因名为度军井。元淮南王闻其异，取栏置庭中井上，击之无验，随送还。至今呼为‘圣井栏头’。”

黄辅又有诗作，怀念岳家军与古井的渊源：“三军得水自安然，无怪千秋圣此泉。当日地灵犹护宋，至今遗恨诏来仙。”岳飞的爱国情怀，也深深地影响着如皋人。抗战时期，共产党政权将袁桥附近定名为“度军井区”。以井名区，在如皋历史上是罕见的。

除去上述三口古井，如皋还有大量古井。饮水不忘凿井人。一座座古井，见证了大众艰辛的劳作，也蕴藏着如皋丰富的人文内涵。

下图左起：玉涓井，乾隆本《如皋县志·度军井》书影。



南通的茶食糕点

□陶大和

何谓茶食？《大金国志·婚姻》中说：“婿纳币，皆先期拜门，亲属皆行，以酒饷之……次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可见茶食应是糕点糖果的总称。南通地区茶食以花式新颖、品种繁多、质优味美而驰名。19世纪初就有镇江人在南通，如皋等地开设茶食店。清道光五年（1825）南通城区有规模较大的茶食店景福斋，清光绪年间有双福斋、同和等茶食店。民国初年又有稻香村、大兴等茶食店。是时，品种以苏式、镇（江）扬（州）式茶食糕点为主，代表品种有桃酥、细麻饼、京枣、雪枣、鸡蛋糕、云片糕、嵌桃麻糕、八珍糕、茯苓糕、芝麻糕、薏米糕、方糕、潮糕、百果花糕、状元糕、豆包、麻圆、小墩子等。此外，有专营大油墩子和脆饼的店铺。民国三十年（1941），南通城区有12家茶食店，职工约60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城区有茶食店21家，职工近百人（不含“连家店”“夫妻店”）。是时，城区较大的南后街也生产经营茶食糕点，如鼎泰、沅大昌、江源昌、顺和斋等，并有20多家专营馓子、脆饼的店铺。

1949年2月，南通城解放，时城区有茶食、馓子店约60家，唐间有20家，天生港有10家，这些茶食店的传统经营方式是前商后工，都是手工操作、自产自销，其中，资本较大、职工较多的有鼎泰、可口、大隆、稻香村四家，其他绝大多数茶食店都是小本经营。1955—1956年，市区茶食糕点业，先后建立了食品生产合作社，其中，城区建成第二食品生产合作社。1958年7月，全市（包括唐间、天生港）建立市食品合作社二厂，下设大隆、稻香村、王桂记、福生祥、鼎隆、唐间、天生港7个茶食加工工场和1个饴糖加工工场，生产工人200余人，设有门市部26个，营业员82人。1960年7月，市食品一厂、二厂合并，更名为南通市食品厂。1962年1月，原二厂与食品厂分开，另设南通市茶食合作工厂，专业生产、经营糕点。1969年12月，市茶食厂设有5个加工工场、9个门市部，有职工292人，是年先后下放职工37人，9个门市部全部撤销。1970年，市茶食厂在人民路196号新建厂房，1976年定名为南通市食品二厂，1984年，在任港乡城港村重建厂房，到1987年末，生产产品除传统的苏式、扬式糕点外，还引进了广式、潮式、京式等各种式茶食糕点，西式裱花蛋糕等，产品品种规格品种170多个，花式品种200多个，其中苏式、省优质产品称号的有嵌桃麻糕、裱花蛋糕、桃酥、麻油月饼等。20世纪60年代开始，茶食糕点生产由全手工操作，逐步实现了部分机械化制作。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工序，如烘烤、搅拌、粉碎、切糕、切糖等，都用机器代替了人力，1987年全年产量2348吨、产值448万元。

卜之琳延安行

□陶建明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著名诗人卜之琳的代表作《断章》。卜之琳（1910—2000）海门人，曾用笔名季陵、薛林等，我国杰出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曾是徐志摩的学生，被公认为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2000年1月，卜之琳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首届夏新杯中国诗人终生成就奖”。

上图左起：年轻时的卜之琳，卜之琳（右一）从延安前往太行山区（1938年），卜之琳的著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和《慰劳信集》。

想证明自己的凌云之志

卜之琳，海门汤家镇（现海门区三厂）人。1929年秋，19岁的卜之琳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徐志摩是他的老师。卜之琳写了一些诗，被徐志摩拿到自己主编的名刊《新月》上发表，卜之琳受到极大鼓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诗集《汉园集》《三秋草》相继问世，奠定了卜之琳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1933年9月，卜之琳在沈从文家认识了同在北京大学学习、有着共同文学爱好的苏州女子张充和，并很快成为朋友。卜之琳苦苦追求张充和，他那首风靡一时的诗作《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为他的才女张充和而作。卜之琳写得一手好诗，却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与张充和开朗洒脱、活泼好动的个性截然不同。

1938年春，张充和在卜之琳百般邀请下下来到成都。卜之琳追求张充和的过程是相当苦涩的，此时卜和张并未分手。恰好沙汀和何其芳联系去延安的行程安排，张充和暗示卜之琳勿忘邦国大事。卜之琳要证明自己，“当他苦苦寻找而不得的时候”，他要向女友张充和“证明他有凌云之志”，于是在四川大学任教。卜之琳匆忙告别女友，利用暑假和军训时间，于1938年8月14日，与何其芳、沙汀及夫人黄玉頔4人从成都乘汽车出发，踏上奔向延安的征途。一路上他们沿川陕公路北行，24日到宝鸡，25日坐陇海路快车到西安，28日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离开西安。途中，卜之琳一路目击许多青年“背着行李，徒步跋涉”“络绎不绝，意气风发”，这种“盛况”使卜之琳沉醉于“歌声笑语”，但“心中有愧”，另一方面也同先前在国统区的所见所闻形成鲜明的对比。31日，卜之琳一行抵达红都延安。

卜之琳延安之行，在朋友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不少人深感惊讶，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羸弱的书生会投奔抗战前线。

文艺生命在延安获得新生

8月31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卜之琳一行住在西北旅社，受到刚从前方返回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领队丁玲、田间

的热情接待，进行了畅谈。

在周扬引荐下，卜之琳、何其芳、沙汀几人上杨家坪，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鼓励他们到前方战斗生活中去。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怀着“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渴望的卜之琳，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到了延安以后，卜之琳不像沙汀夫妇与何其芳去参加工作，而是临时住在延安城内柯仲平主事的文化协会。

在这里卜之琳受到高规格的礼遇。他被引荐给不大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初到文协住的时候还受到胡乔木等同志的看望。延安的党政军文化高层对卜青睞有加。随着不断融入，卜之琳的文艺生命在延安也获得新生。初至延安，卜之琳就积极地投入文艺活动中。1938年9月11日，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卜之琳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等待过黄河上前线的11月上旬，卜之琳为响应号召写“慰劳信”（“慰劳”实为“致敬”之意），欣然就以诗体先写了两封（首），一封《写给抗日战士》，另一封《写给修筑延安机场工人》，后发表于《文艺战线》。

1938年11月12日，卜之琳随吴伯箫为团长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向晋东南出发，并同朱德总司令部人员过黄河，由垣曲进入被日寇侵占了一年多的晋东南地区。卜之琳不畏艰险，灵活机动地深入广大军民，采集素材，陆续写成《垣曲风光》《山道中零拾》等10篇战地通讯，又写了《五个东北工人》《钢盔的新内容》等散文。

1939年初，卜之琳随吴伯箫等奔赴河南武安，跟着那里的先遣游击支队，在彭城一带辗转打击日寇。利用战斗间隙，卜之琳俯身在农家场石磨上，写成反映游击队的小说《红裤子》，发表于重庆的《文艺月报》，后译成英文在英国《人生与文学》刊发，还先后被选入英国出版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与美国出版的《中国抗战小说选》。

成为随军记者

1939年4月，卜之琳与吴伯箫等离开武安进入太行山，抵达和顺附近，到了

北上抗战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陈赓七七二团临时驻地。在七七二团，卜之琳与指战员们一起行军打仗、缴获战利品，一起吃粗粮、睡草铺、晒太阳、捉虱子；和吴伯箫等深入当地农村，一起开会、宣传、贴标语，与群众一起收种庄稼、挖坑道、搞坚壁清野……在抗日最前线搜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回到延安后，卜之琳一边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课，一边整理材料，他以七七二团为素材，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1940年经陈元培带往香港，由明日社在香港出版。

在书中，卜之琳以饱满的激情、独特的视角，引人入胜地记述了七七二团抗战初期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的历程。他不仅叙写了长生口、七亘村、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经过，更着重把笔触放在写“人”上，从指挥官——旅长陈赓、团长叶成焕到普通战士，他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让他们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1980年，《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在香港再版；3年后，这本书第一次在内地在三联书店出版。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位原本专注地研究英法文学、写抒情诗的书生，却又无反顾地奔赴卫国疆场，成为一名在枪林弹雨中出没的随军记者、一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战士。

一种“新型政治抒情诗”

1939年四五月份，卜之琳从前线回到延安。因当时已在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文学系任教的沙汀、何其芳从北路渡过黄河去了前方，还没有回来，周扬与当教务长的吕骥就安排卜之琳和严文井临时在“鲁艺”顶替执教。

5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卜之琳和严文井代表抗敌文艺工作团第三组作了《关于前线工作情形及收获经验、教训的报告》，他还参加了由周扬主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战线》的编辑。他在《文艺战线》以及《文艺突击》上刊登《写给抗日战士》《写给修筑延安机场工人》的慰劳信、速写与通讯。

时任鲁艺系主任的周扬，希望卜之琳他们能留下，在鲁艺任教。同行的何

其芳和沙汀都答应了，只有卜之琳以在四川大学留有教职婉言谢绝了。离开延安前，卜之琳去了趟王明家。王明向他讲述了萧三写白话诗的掌故，卜之琳开玩笑说王明犯了“自由主义作风的毛病”。

1939年8月卜之琳在周扬的安排下，按原计划离开延安，返回西南大后方的成都四川大学复职，并随学校迁峨眉山，住雷音寺。

卜之琳在延安抗战前线前后历时一年，他除写出一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地报道、杂文、短篇小说外，还写出了20首令人耳目一新的反映延安军民的诗，合为《慰劳信集》。

初到延安卜之琳就为“多少青年男女进进出出，不拘形迹，自由自在，边走边唱”而“感奋雀跃”，“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的局面就实在令人心醉，使我也飘飘然好像置身另一个世界”——卜之琳晚年回忆道。因而，当文艺界发起“慰劳信”活动后，卜之琳当时就提笔完成“两封”。1939年11月，回到大后方之后卜之琳又继续用这种《慰劳信集》写了十八封，给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个人或集体。

《慰劳信集》“都是写真人真事，而一律不点名，只提他们的岗位、职守、身份、行当、业绩，不论贡献大小，级别高低，各具特殊性，也自有代表性，不分先后，只按写出时间排列，最后归结为一切劳苦者。”这是劳动人民的颂歌，如“拾铁轨的群众”“修筑公路和铁路的工人”“给空军战士”等。它以宣传和歌颂全国上下各方齐心协力、一致抗日为宗旨，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外化，不同于同一时代某些业已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诗，是一种新诗史上未曾有过的至今有人效法的新型政治抒情诗”。

1940年，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慰劳信集》由香港明日社出版。到学年结束，四川大学校方才知道卜之琳去过延安，不予续聘。于是，卜之琳转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与张充和会合。

延安之行，对卜之琳以后的人生及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的创作观从此发生很大变化。1949年，当全国解放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的卜之琳回到了祖国。

日寇占领南通后流传民间的南通话

□施亚

抗战前后持续14年，江海儿女与千千万万的中华将士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一往无前、共赴国难。为铭记历史，赓续伟大的抗战精神，特写此稿。

■“日本倭上岸”

1938年3月17日，星期三，农历戊寅年二月十六，这一天拂晓，日军板垣师团饭袋旅团5000余人从姚港东十万步荡（现为崇川区洪江村南）登陆。

登陆姚港之日，日军选择了在凌晨突袭，又借助飞机掩护，上岸之时只遇到小规模抵抗。国民党的少量地方武装未能抵抗住海、陆、空立体作战的日寇精锐之师。

守卫通城段家坝的南通区司令部卫兵二连与日军一部在公共体育场激战一小时。长桥一线守军，地面遭易家桥方向来敌猛烈进攻，上有日机盘旋扫射，守备此地的卫兵一连终于抵抗不住。国民党江苏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葛肇、南通县长彭龙骧等则闻风弃城而逃。九时许，南通城即告沦陷。

这一天是南通城沦陷之时，也是南通人民难以忘怀的耻辱之日。1997年3月，南通人民在当年日军登陆处——崇川区姚港东首树碑，碑上有梁灵光题写的“振兴中华 勿忘国耻”八个血红大字，记述着南通城一段令人哀恸的往事，用以警醒世人。梁灵光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任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因为日军是从长江上突袭登陆南通的，所以南通老百姓就把日本侵占南通说成了“日本倭上岸”，这一南通人特有的说法至今仍在流传。

■“日本倭子”

千百年间，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南通一向闭塞，对于土生土长的南通人来

说，东洋人长什么样可谓一无所知。明朝时期，日本海盗侵犯我国沿海，南通城也被多次侵扰，日本倭寇的形象，第一次进入了南通人的视线。

“倭”一词，在中国古代就是代指日本的，这个字在汉字中也有“矮”的意思。南通市区城山路上就有古代留下的“倭子墩”。

自从日军占领南通城，在关卡设立哨所、下乡扫荡，南通人对日本兵有了一个最为直接的印象，即他们的个子不及中国人高。这就有了南通人才说的昵称“日本矮子”。有资料表明，在1939年之前，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1米55。当然随着日本人战后饮食的变化，至今身高已有了较大提升。根据世界人口评论公布的数据，日本的平均身高已经达到1.72米。

■“洋箱子”

本人当年上山下乡，在城郊农村插队时，听到顽童恶作剧时乡人讨厌，急起来会用一些恶语诅咒，比如背鞞儿、翘辫子、细洋箱子等等，这些恶语是诅咒死亡之意。咒人死，应当是骂人最狠最毒的词儿了。

何谓“洋箱子”？一直不解其意。后来读书偶然读到日军侵略中国，凡战死官兵，一般都被火化，骨灰装进一只小箱子，运回日本老家下葬。这才恍然大悟，乡人诅咒他人的恶语“细洋箱子”，就是日本人的骨灰箱子。

1938年3月17日，5000日本鬼子是从姚港突袭登陆，当日南通便告沦

陷。这批侵略者的队伍里有个名叫荻岛静夫，的，虽说是农民出身，但爱好照相和写日记。他当年留下的近20万字日记和208幅照片后来被中国藏家收购，由人民文学社2005年8月正式出版，书名《荻岛静夫日记》。

提及荻岛静夫这个人，是因为他在日本部队里是专干火化战死日本官兵的特殊军人——“火葬兵”。据他所记，在他1940年退伍回国前，他所在的部队也从入侵中国时的5000人变成了300人，仅其本人就先后参与焚烧了1000多具日军尸体。他的日记有十多篇为侵占南通、如皋、海安等地的战况实录。

1940年初荻岛静夫随101师团奉调回国。1944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32岁的荻岛静夫再次应征入伍。就在那年7月18日，他在与美军的塞班岛之战中战死。

“十二日那天，我们四名士兵抱着必死的信念挖掘出了队长的遗骸，昨天晚上就火化了。”“今天，联队各部分的联络不畅通，也没有来火葬的。”“晚上，战友的火葬通宵进行。”“从昨天到今天，我在小宅和曹宅里检视了二百多具尸体……”这类焚烧日军尸体的文字，在《荻岛静夫日记》一书中比比皆是。

经查，骨灰盒，日军叫“骨壶”，一般是陶制或是瓷制的。在日军的观念里面，那些死于异国他乡的人，只好将其火化，然后用“骨壶”盛放再装入木箱里，外面包上白布，由亲人挂在脖子上，捧在胸前带回老家。当年日寇被中国军队打得死伤无数，所以一些日本兵行军作战，

还得带上被击毙者的骨灰盒。

东洋兵就地火化在以土为安的中国人看来，未免太残忍了，自然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竟产生了“细洋箱子”这一咒人之死的恶语。

■“四哥”“四老爹”“台子脚”

抗战时期，在南通一带抗击日军的是我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英烈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谱写了一曲壮歌。新四军著名的烈士就有白桐本、王浩、宋祖望等。

由于南通为敌占区，南通人民私下称呼新四军只能用其他代词隐晦地来表达。其中“四哥”“四老爹”就是新四军的一种代称。甚至为防“隔墙有耳”，有时只是伸出四指予以示意。

一首流传于南通本地的民谣就这样唱着：日本倭上岸闹“空防”（日机轰炸，有时以此虚张声势），黄狗（指国民党部队）溜来黑狗（指日伪军）吭。二月十六（指农历）港闹闹，鬼子汉奸下了乡。四哥部队本领高，不怕日本倭有刺刀。日本倭下乡来烧杀，就怕遇上台子脚（南通话台子即桌子均为四只脚，也指新四军）。四哥部队一出发，日本倭躲进碉堡做王八。四哥哥胆大到处跑，日本倭像老鼠见了猫……

随着胜利，新四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哥”“四老爹”“台子脚”等抗战时期产生的特有的南通词汇逐渐失去了存在土壤，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土语指称的是谁、又是如何产生的，但这些词汇在一些回忆录以及南通的史志中有所记载。